

战争记忆与对外经济交流

薛畅 李嫦 胡一川*

摘要: 国家间战争冲突的记忆是长期影响国家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抗美援朝烈士数据,从地级市层面考察了战争记忆对各地引进外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抗美援朝烈士相对越多的城市,吸纳美国企业的并购投资规模越小,短期内中美元首会晤和中美关系改善对并购的增进作用在这些城市也较弱。本文还发现跨省移民弱化了迁入地长期战争记忆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对新时代中国扩大开放和发展新型大国外交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抗美援朝; 历史记忆; 外国并购投资

DOI: 10.13821/j.cnki.ceq.2023.01.22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经济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方向。2019年中国吸引外资达9415亿元人民币,保持了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影响跨国投资的因素是当今国内外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话题(Fan et al., 2018; Haufler et al., 2018; Alquist et al., 2019; Azzimonti, 2019; 李磊等, 2018; 吕越等, 2019)。国家间的投资虽然是企业行为,但是国际社会的核心主体依然是主权国家,国家间围绕政治因素的合作与冲突,必然会投射到经济领域上来,影响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投资活动的影响(Berger et al., 2013; Du et al., 2017)。国际战争作为国家间最为激烈的一种政治冲突方式,对跨国投资的重要影响更是不言自明。战争是伴随着剧烈暴力和严重人员伤亡、财富损失的冲突,会对一国国民和民族的历史记忆、社会心态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Guiso et al. (2009)发现历史上战争冲突多的国家之间,在战争结束多年后,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仍然较少。

近代以来,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几乎都发生过战争级的军事冲突,这些历史冲突对当今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影响,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经济学实证研究话题,但现有的研究却比较少。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除了抗日战争外,只涉及局部区域,规模和影响范围有限,对民族历史记忆的直接影响可能也有限。局部战争的冲突可能集中于军事价值高的地区,而同时期中国革命战争也是连绵不断,

* 薛畅,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嫦,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胡一川,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胡一川, 上海市四平路1500号同济大厦A楼2006, 200092; 电话: 13817631745; E-mail: ychu@tongji.edu.cn。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048、72203159)的资助。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413000271)的资助。感谢杜巨澜、钟宁桦等专家提供的宝贵建议和帮助。文责自负。

新旧军阀连年混战,各类军事冲突事件交织在一起,难以断言长期影响的真实来源。第二,近代几次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匮乏且质量难以保证,学者们难以准确地度量战争对社会的冲击,进而难以准确估计其长期影响。第三,历史相关话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既往的制度、习俗等长期因素,给识别因果关系带来挑战。因此,对于这一重要命题的研究需要寻找一场影响范围清晰、与其他战争冲突存在显著分别并且社会影响足够大的对外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规模仅次于抗日战争的一次对外战争,全国牺牲烈士人数达197 653人¹,所涉及的地级市达304个。评估战争等冲突的长期影响,常需要以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来测度不同国家和地区受冲击的程度(李兵和任远,2015; Che et al., 2015)。不同于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匮乏的民国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不同地区在战争中人员损失有准确数据。此外,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完全在中国境外,战争给中国各地造成的人员损失与这些地区本身的军事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可以避免战争损失通常涉及的各地自然环境、交通等区位因素以及既往的文化、制度等长期因素,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识别机会。

从中国社会的记忆认知来看,这场战争的长期影响不容低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²本文基于百度指数,从网络搜索量比较了2011—2019年“抗美援朝”和“抗日”的搜索频度,发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抗美援朝”的搜索频度显著高于“抗日”,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对于抗美援朝的关注,并不亚于抗日战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历史记忆自然更容易被传承和放大,广泛地影响社会情绪,因而抗美援朝烈士较多的地区,可能较少抱有对美国的正面印象,对引进来自美国的投资并不积极。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对于东道国特别是投资目标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也对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Frésard et al., 2017; 李善民和李昶, 2013;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4)。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本文选择跨国并购作为研究对象,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跨国并购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最重要手段,年均占比在60%以上。根据SDC Platinum数据库,2018年中国接受海外并购投资总额达到629.9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第二,相对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涉及收购当地企业,而并购后往往会有员工被解雇,因此在东道国可能受到的抵触情绪更高,受到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大(Davies et al., 2018)。第三,并购涉及收购方和目标方双方企业,特别是在非全资收购中,并购后企业经营仍受到东道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双重影响,文化冲突等会显著影响并购整合的成本和并购的经营绩效(Ahern et al., 2015)。因此,本文选择外国并购投资这一更容易受到战争记忆的长期历史因素影响的投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以往有关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层面的因素,较少将视线对准外资并购在一国内部的地区间差异。Chung and Alcácer (2002)实证分析了美国各州的研发

¹ 罗铮、段君奉,“437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沈阳”,《解放军报》,2014年10月30日,第3版。

²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4日,第2版。

投入和引进外资的联系；Kandilov et al. (2017) 研究了美国各州银行监管政策的放松对于并购投资流入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从地区的现行政策出发，鲜有文献探索一国内部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差异对跨国并购产生的持久影响。

据此，本文使用 SDC Platinum 数据库中 2000—2019 年外商在华并购事件作为样本，根据“中华英烈网”公布的全国《烈士英名录》整理了地级市层面抗美援朝牺牲的烈士籍贯信息，采用双重差分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分析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外商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烈士数量越多的地区，美国企业在当地进行兼并收购的数量和规模显著地变少。这表明，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员损失相对越多的地区，对美国的正面印象越弱，对美国在当地的投资活动越不欢迎。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和对中美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后，该结果保持一致。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各地解放时间和到朝鲜边境的公路距离作为烈士人数的工具变量，结果保持稳健。最后，本文分别以外县区迁入人口和外省迁入人口测度移民占比，发现距离越远、经济文化背景差异越大地区间的人口迁徙，越容易冲淡迁入地固有的历史记忆及其对当地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本研究表明，抗美援朝战争导致的人员损失对美国在中国各地区投资的规模产生了相当持久而显著的负面影响。

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本文丰富了国际政治因素对实体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针对国际政治关系对于两国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已有研究考察了政治体制相似度、战争冲突、政变、元首出访等因素对于国家贸易的影响 (Morrow, 1998; Nitsch, 2007; Quresh, 2013; Berger et al., 2013)，但鲜有研究聚焦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争冲突。本文针对中美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发现战争的人员损失程度对来自战争对手方的跨国投资存在显著的长期负面效应，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来自发展中大国内部的视角和成果。与本文最为相关的研究则是 Che et al. (2015)，该文将研究视角对准抗日战争，发现日本企业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员伤亡较多的省份投资较少。从现实来说，中美关系相对于中日关系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从研究内容来说，本文不仅关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记忆给不同地区吸纳外资带来的长期影响，并且探究当代的政治交流、中美关系变化和地区移民与战争记忆的交互性，提供了更为动态性的研究视角，这在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针锋已现的背景下具有学术和现实价值。

第二，本文丰富了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并购国和东道国的国家层面因素对跨国并购进行影响机制的分析，比如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两国间汇率的波动、股票市场的发展程度、工会制度差异、文化价值观差异等 (Rossi and Volpin, 2004; Erel et al., 2012; 董莉军和谢家国, 2014; Ahern et al., 2015)，这些因素与跨国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整合成本密切相关，从而对并购的规模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首次以两国间战争冲突为研究视角，补充完善了文化和政治因素对跨国并购影响的文献。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主要是国际政治关系对双边经贸关系影响的研究，以及战争、革命对经济影响的研究；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基本的研究设计方案；第四部分展示实证结果，包括基准结果、稳健性检验、基于中美元首会晤及中美关系指数的跨时分析和以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的回归结果以及移民对于长期历史记忆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全文总结。

二、文献回顾

国际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的文献中, Morrow (1998) 是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研究, 发现两个利益关系相似度越高的国家和同为民主政体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会显著更高, 但两国结盟和发生军事冲突, 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Glick and Taylor (2010) 基于跨国数据, 发现战争冲突显著缩减了两国间的贸易规模, 并且严重降低了各国的经济福利水平。Quresh (2013) 则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对贸易影响的溢出效应, 发现国际和国内战争对战争周边未参战国的外贸也有显著抑制作用。部分文献分析了战争之外的国际政治事件对两国经贸往来的影响。Berger et al. (2013) 利用冷战时期美国及苏联安全和情报机构的资料, 发现被美国成功策动政变的国家从美国进口商品额会显著增加, 而且增加的主要是美国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产品。Nitsch (2007) 则使用美、法、德三国首脑出访外国的数据, 发现出访会使三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显著增长, 而且各类型的出访均有此效果。中国近年周边相对和平, 暂无有关对外战争对中国对外贸易或投资当期影响的研究, 但是政治关系成为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决定因素的新兴重点。Du et al. (2017) 使用阎学通等 (2010) 量化中国与特定国家关系衡量的方法和 1990—2013 年的月度贸易数据, 研究了中国同其他主要国家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发现政治关系的波动对中国对该国出口贸易有一定影响但是并不持久。闫雪凌和林建浩 (2019) 分析了领导人访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发现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在当期增长 40%—60%, 而外国领导人来访平均会带来 20%—40% 的增长。

在该类文献中, 考察两国历史上的政治关系特别是战争冲突对经贸交流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Guiso et al. (2009) 在对欧洲各国国民对其他国家信任度的研究中发现, 历史上的冲突会显著降低两国间的信任程度, 进而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较少。Che et al. (2015) 基于中国 2000 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 发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人口伤亡相对较多的省区与日本的经贸联系较少。Gao et al. (2018) 则分析了日本在华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与日本侵华历史关系后发现, 中国因日本侵华人口伤亡较多的地区接受日本投资较少, 而且日本投资在当地的绩效也较差。

有关战争等政治冲突长期影响的文献, 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各国国内的制度、经济绩效、人力资本等因素上 (Acemoglu et al., 2011; Miguel and Roland, 2011; Singhal, 2019), 而非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国在近代经历了若干场局部战争和全国性战争, 为研究暴力冲突的长期作用机制提供了实例。李楠和林鑫 (2015) 研究了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中国人口的长期影响, 发现受战争影响的地区, 人口增长率比未受影响的地区平均低 35%; 王守坤 (2017) 研究了红军长征对经过地的长期影响, 发现长征经过的县更容易被评为革命老区县和国家级贫困县, 从而能获得更多的上级转移财政资金。李飞跃等 (2019) 指出抗日战争强化了中国特色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发现抗战时期建立中共县委多的地区, 在 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 当地政府的规模较小, 但政府支出更偏向于公共品, 且非国有经济的占比高。但迄今抗美援朝战争尚未进入经济学实证分析的视野。

综上所述, 两国的战争冲突无论是在当期还是长期, 对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有明

显的负面作用。当期来看，战争行为几乎是两国矛盾最严重的表现，通常各国政府都会限制或禁止与交战国的贸易投资活动，导致经济交流成本急剧上升。而且战争会导致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被打断，影响其与所有国家的往来。不过从长期来看，这种负面作用更多地是通过影响公众的历史记忆来实现的，因为国际战争是典型的国家行为，本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越严重，必然导致公众对交战国的负面印象越持久，并通过社会交流和教育传承下去。抗美援朝战争导致中国方面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虽远小于抗日战争，但如引言部分所述，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心理和记忆的长期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三、数据和实证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0—2019年中国企业作为被收购方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SDC Platinum数据库。并购样本涉及242个城市和68个国家。因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中国各地级市吸引外资的影响，我们将交易层面的并购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地级市-国家维度的数据结构，共16456个观察值。³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承载着各城市的战争记忆，烈士人数的多少能够反映出该城市的战争记忆。本文手动整理了“中华英烈网”公布的全国《烈士英名录》数据，根据烈士的牺牲时间、地点和事迹等资料，最终确认了188285名抗美援朝烈士的资料，占已确认烈士总数的95.3%⁴，这一数据应能全面反映各地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人员损失。与并购数据类似，本文将烈士数据加总到了地级市层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于1953年7月，恰好当年进行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本文根据198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计算按现行地级市区划的1953年人口，计算各市烈士占1953年人口的比例，作为各市抗美援朝战争历史记忆的核心指标。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取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

（二）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本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法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MAValue_{ic} = \beta_1 US_c \times Martyr_i + \beta_2 US_c \times Z_i + \beta_3 Distance_{ic} + \delta_i + \theta_c + \epsilon_{ic}. \quad (1)$$

模型(1)中的*i*和*c*分别代表被收购公司所在地级市和并购方所在国家或地区。本文基准回归模型基于城市-国家维度的数据结构进行分析；在考察元首会晤和中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时，本文进一步将数据结构拓展成城市-国家-年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 $MAValue_{ic}$ 表示2000—2019年期间*c*国企业在城市*i*并购交易的总金额，回

³ 本文从样本中删去了新疆、青海、西藏这三个因地理等原因参与抗美援朝较少的省区。SDC Platinum数据库提供的目标企业所在地信息是目标企业本身所在的城市而非母公司的注册地。如果目标企业是集团下属的子公司，那么在本文样本中只会计入这个子公司所在地的并购，与集团其他地区的分公司无关。

⁴ 抗美援朝纪念馆从2000年起，对抗美援朝战争烈士资料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征集整理，总计烈士总数183108人。而到2014年10月，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累计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总数增加到了197653人。需要指出的是，抗美援朝烈士总数包括了在中国方面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所有牺牲人员，大部分为志愿军作战阵亡和事故、患病而牺牲的志愿军指战员，也包括牺牲的无军籍的中国医务、交通、勤务、文艺等工作者的。

归中加1取自然对数值。关键解释变量是 $US_c \times Martyr_i$ ，即国家 c 是否为美国的虚拟变量和城市 i 牺牲的抗美援朝烈士数目的交乘项。为了避免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于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将 $Martyr_i$ 定义为抗美援朝烈士数目除以各市1953年人口。 $Distance_{ic}$ 是地级市 i 到国家或地区 c 的直线距离，用以衡量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之间人员和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的难度。⁵

Z_i 包括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因基准回归采用截面数据，本文选择居于样本期初的2000年对各控制变量进行度量。回归中控制各市GDP总额、人均GDP($GDP\ per$)、外商直接投资(FDI)、金融业占总就业人口比例($Finance$)、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分别反映这些地区的经济规模、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的综合水平，前三个变量的数据取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贸易数据取自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回归时均取自然对数值，金融业就业数据取自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p25	中位数	p75
$MAValue_{ic}$	$\ln(1 + \text{城市 } i \text{ 中来自国家 } c \text{ 的并购交易总金额})$ ，交易金额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0.208	0.984	0	0	0
US_c	虚拟变量，主并公司所属国家 c 是否是美国	0.015	0.120	0	0	0
$Martyr_i$	1953年城市 i 每千人口抗美援朝烈士的数目	0.323	0.298	0.124	0.250	0.444
$\ln(GDP\ per)_i$	城市 i 在2000年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元人民币)	10.446	0.559	10.015	10.417	10.799
$\ln(GDP)_i$	城市 i 在2000年GDP的自然对数值(亿元人民币)	7.160	0.876	6.622	7.034	7.697
$Finance_i$	城市 i 在2000年金融产业就业人口与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0.008	0.005	0.005	0.007	0.010
$\ln(Trade)_i$	城市 i 在200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万美元)	12.061	2.099	10.589	12.121	13.414
$\ln(FDI)_i$	城市 i 在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值(万美元)	10.016	1.852	8.987	10.077	11.202
$Distance_{ic}$	城市 i 到国家或者地区 c 的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值	8.984	0.605	8.811	9.065	9.384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结果

模型(1)的基准回归结果展示于表2中。被解释变量是并购交易总金额，关键的解释变量是主并公司为美国公司的虚拟变量与城市抗美援朝烈士人数比例的交叉项。本文在控制地区和国家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地区经济发展、地区金融发展以及地区对外贸易和投资特征变量与美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列(1)结果显示，关键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抗美援朝战争形成的城市战争记忆会对半世纪之后的中国吸引外资并购分布产生长期影响，即当该城市

⁵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越多，该地企业接受美国企业的收购越少。列（1）中美国虚拟变量与城市人均 GDP 和城市 GDP 的交乘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示城市经济体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对吸引美国企业并购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数值显示，当一个城市抗美援朝烈士人数比例增加 1 个标准差时，该城市接受来自美国公司的跨国并购金额，相比来自其他国家公司的跨国并购金额要低 23.36%（ $=0.298 \times 0.784$ ）。

考虑到跨国并购对于资金量的巨大需求以及当地金融服务水平的重要性，我们在列（2）中进一步加入了各城市金融发展程度与美国虚拟变量的乘积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金融业越发达的地区对于美国企业的并购越有吸引力。另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或者替代的依存关系，我们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和国际贸易总量。列（3）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抗美援朝交乘项依然显著为负，这一反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人员损失长久地刻画在各城市的战争记忆中，对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规模形成长期的负面作用。此外，考虑到并购总金额可能被极少数规模巨大的并购案所影响⁶，本文也考察了城市战争记忆对于跨国并购案数目的影响。列（4）中被解释变量为 c 国在 i 城市的总并购交易次数加上 1 的自然对数值，回归结果与前三列保持一致。同时，列（5）以抗美援朝烈士总人数的对数值作为替代性解释变量，因为对一些涉及人员伤亡和死亡的重大社会事件，如新冠肺炎大流行病，人数的绝对值可能对社会心理有直接影响⁷，回归结果仍在 5% 的水平保持显著。列（6）则参照 Silva and Teneyro（2006）的方法，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PPML）以并购额直接作为被解释变量，处理大量观测值为 0 的情况，回归结果仍在 1% 水平保持显著。总的来看，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抗美援朝烈士人数比例以及绝对人数较高的城市，来自美国的跨国并购金额和笔数均显著降低。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US \times Martyr$	-0.784** (0.344)	-1.018*** (0.347)	-0.972*** (0.341)	-0.356*** (0.114)	-0.231** (0.111)	-0.988*** (0.294)
$US \times \ln(GDP\ per)$	1.130*** (0.236)	0.307 (0.335)	0.208 (0.359)	0.00763 (0.138)	-0.0960 (0.384)	-0.142 (0.319)
$US \times \ln(GDP)$	0.923*** (0.176)	1.199*** (0.184)	1.083*** (0.214)	0.504*** (0.0761)	1.389*** (0.277)	0.139 (0.154)
$US \times Finance$		0.0183*** (0.00453)	0.0179*** (0.00444)	0.00763*** (0.00173)	0.0166*** (0.00442)	0.00887*** (0.00194)
$US \times \ln(Trade)$			0.0321 (0.0928)	0.0541* (0.0322)	0.0275 (0.0993)	0.128 (0.105)
$US \times \ln(FDI)$			0.0536 (0.0683)	0.00350 (0.0254)	0.0678 (0.0662)	-0.163*** (0.0579)

⁶ 例如，根据 SDC Platinum 数据库，2015 年卡塔尔投资发展集团和哈马德·本·苏海姆企业集团以 50 亿美元收购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49% 的权益，该收购的交易金额占到了山东省菏泽市在样本期内 7 笔跨国并购总金额的 97.50%。

⁷ 感谢匿名审稿人为我们指出这一点。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i>Distance</i>	-0.276*** (0.0582)	-0.273*** (0.0581)	-0.273*** (0.0581)	-0.142*** (0.0301)	-0.272*** (0.0581)	-0.242* (0.13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 456	16 456	16 456	16 456	16 456	13 786
R^2	0.406	0.409	0.409	0.482	0.409	—

注：*、**、***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其他革命烈士因素

抗美援朝烈士较多的地区，可能也是其他革命斗争中烈士较多、革命意识强的地区。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征兵方式是动员制⁸而非义务制，革命斗争史更严酷、革命意识强的地区的群众可能会更自愿地参军，就可能有更多的烈士。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时间上相连，志愿军相当部分兵员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因而抗美援朝烈士多的地区可能也是既往反帝意识强的地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抗美援朝的历史记忆。为了验证这一解释，本文分别使用民政部编纂的《境内烈士纪念设施统计图册（2011）》中各城市已安葬的烈士人数和基于“中华英烈网”的《烈士英名录》中各城市登记在册的全部烈士人数，以此作为革命意识的代理变量。

本文在基准回归方程中分别添加了两个革命烈士总量各自和美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结果如表3所示。两个烈士总量交乘项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在10%的水平下均不显著，抗美援朝烈士交乘项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为负。这表明革命烈士总数相对较多的地区尽管总体上看美国的并购业务量相对较小，但是对引进外资的国别选择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性较低。美国在中国各城市的并购业务受到的长期影响主要来自抗美援朝这一事件本身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而非城市的整体革命历史经历或革命意识形态。

表3 其他革命烈士因素的影响

	(1)	(2)	(3)	(4)	(5)
$US \times Martyr$		-0.961*** (0.341)		-0.958*** (0.346)	-0.952*** (0.345)
$US \times$ 本地安葬烈士/1953年人口		-0.0302 (0.0213)	-0.0284 (0.0197)		-0.0215 (0.0176)
$US \times$ 全部登记烈士/1953年人口			-0.0318 (0.0199)	-0.0299 (0.0195)	-0.0245 (0.0191)
$US \times$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Distance</i>		是	是	是	是

⁸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007页。

(续表)

	(1)	(2)	(3)	(4)	(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 456	16 456	16 456	16 456	16 456
R^2	0.408	0.409	0.408	0.409	0.409

2. 抗美援朝战争前的经济和文化因素

抗美援朝烈士在各城市的人数并不是随机分布，战前的历史文化因素会影响烈士人数，进而使得回归结果存在偏差。⁹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搜集了可能影响抗美援朝烈士数的五个前定指标，将其纳入回归：(1) 1927 年及以前各市累计设立的近代新式企业资本总额，数据取自杜恂诚（1991），测度各地旧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程度；(2) 各市在 1840—1949 年所设立的通商口岸（包括租借地）总数，数据取自严中平等（1955），测度旧中国各地对外开放程度；(3) 各市到海岸线的距离，影响各地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4) 各市老区乡镇数量，取自《中国革命老区》；(5)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候补委员籍贯在各市的人数。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变量如果存在 0 值则加 1 取对数。

回归结果列于表 4。第 (1) 列加入了美国国别虚拟变量 (US) 分别和所有五个前定变量的乘积项，第 (2) 列则效仿 Chen et al. (2020) 的策略，添加了全部的国别固定效应与前定变量的乘积项。回归结果显示，美国国别虚拟变量和到海岸线距离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美国在华并购更多地分布在沿海地区；与第七届中央委员数的交乘项显著为负，表明解放初期各地在中央的政治联系可能会长期影响当地对外商投资的态度。在控制了这些历史性因素后， $US \times Martyr$ 始终保持负向显著，系数变化并不大，即战争记忆对美国来华并购投资的显著负面效应依然存在。

表 4 考虑前定变量的稳健性分析

	(1)	(2)
$US \times Martyr$	-0.942*** (0.342)	-0.910*** (0.345)
$US \times$ 新式企业资本总额	-0.00264 (0.0425)	
$US \times$ 老区乡镇总数	0.0205 (0.0719)	
$US \times$ 近代通商口岸数	0.122 (0.360)	
$US \times$ 到海岸线距离	0.276** (0.115)	

⁹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这一宝贵建议。

(续表)

	(1)	(2)
US×第七届中央委员数	-0.571**	
	(0.252)	
国别固定效应×所有前定变量	否	是
US×控制变量	是	是
<i>Distance</i>	是	是
国别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i>Observations</i>	16 456	16 456
<i>R</i> ²	0.411	0.473

(三) 基于中美关系的跨时分析

本文的基准回归是基于城市-国家维度的数据,有关两国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影响的研究常使用两国政治关系的重大负面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如 Fisman et al. (2014) 和 Heilmann (2016) 均以钓鱼岛事件等中日政治争端为冲击,研究了中日关系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在分析两国政治关系冲击经贸往来时,尚未探究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受冲击大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遭受战争创伤较大的地区是否会因现时的政治冲突产生更为强烈的负面反应,或者是否因现时的政治文化交流削弱伤痕记忆的影响?我们认为对一国的历史记忆有可能会被现时关系的变化而唤醒,进而体现在经济交流变化的差异上。本小节将样本拓展至城市-国家-年度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当下的中美关系变化和抗美援朝的长期记忆所带来的交互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

1. 中美元首会晤

本文首先选择以样本期内中美两国元首(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的会晤为外生事件,分析抗美援朝烈士相对数量不同的地区对当下的政治交流是否有显著不同程度的反应。元首会晤尽管受到两国总体关系的影响,但也明显受一些外交因素之外的影响,比如领导人的日程安排、国内事务、身体状况以及国际活动的安排等,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偶然性。本文认为两国元首会晤会向市场释放更为直观的两国关系友好或改善的预期,进而对两国间的并购等投资活动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可能会因战争记忆而产生差异性。为了验证该结论,本文将基准回归中的数据进一步展开成为被收购公司城市-主并公司国家-年度的数据结构,回归模型设定为:

$$MAValue_{ict} = \alpha_1 US Meet_{ct} + \alpha_2 US Meet_{ct} \times Martyr_i + \alpha_3 US Meet_{ct} \times Z_i + \alpha_4 Distance_{ic} + \delta_i + \theta_c + \sigma_t + \epsilon_{ic}. \quad (2)$$

模型中变量 $US Meet_{ct}$ 表示在 t 年中美元首会晤次数,当国家 c 为美国时取值,当国家 c 不为美国时为 0。考虑到并购活动决策执行的时间,本文选择滞后 1 个季度或半年的年度会晤次数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 $MA value_{ict}$ 在基准模型上拓展了时间维度,即 t 年 c 国企业在城市 i 并购交易的总金额(回归中加 1 取自然对数)。控制变量组中 Z_i 不

变，回归中加入其与会晤次数的乘积项。模型（2）同时控制城市、国别和年度的固定效应，回归标准差按城市层面聚类算出。

回归结果列于表 5，列（1）和列（2）分别采用滞后 1 个季度和滞后半年的中元首会晤次数。可以看到，元首会晤次数显著为正，而元首会晤和抗美援朝烈士的交乘项显著为负。说明两国元首会晤能显著促进美国在华并购业务增加，但烈士人数众多所带来的战争记忆削弱了这一投资促进作用。元首会晤无论滞后 1 个季度或者半年，结果差异不大，但使用前者情况下，元首会晤和各交乘项的系数绝对值都相对大一些，说明元首会晤对外资来华的促进作用可能从半年后开始减退。总体来看，抗美援朝所带来的战争记忆不仅会直接影响当下的外资并购规模，而且在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升温迹象推动美国来华并购投资增长时，具有深刻战争记忆的城市所呈现的改善效应也较弱，投资增长程度较低。

表 5 中美关系与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对并购投资的交互影响

变量	中美元首会晤		中美关系指数
	滞后 1 季度	滞后半年	
	(1)	(2)	
<i>US Meet</i>	0.0946*** (0.0244)	0.0620*** (0.0182)	
<i>US Meet</i> × <i>Martyr</i>	-0.0868** (0.0341)	-0.0774** (0.0310)	
<i>Relationship Tone</i>			0.0022** (0.0008)
<i>Relationship Tone</i> × <i>Martyr</i>			-0.0033* (0.001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27 760	327 760	327 760
R^2	0.097	0.096	0.108

2. 中美关系指数

为了更加细致地量化中美关系，本文利用了 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数据库所设计构建的中美关系指数。这一数据库收集了全球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归纳整理每个事件涉及的人物、国家以及主题等相关信息，利用文字语义分析对每一事件的情感态度进行评分，从敌对到合作，分数越高表明双方关系越密切。本研究从数据库中提取涉及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的事件，按照年度将中美双边关系事件评分加总，以年度平均评分作为中美关系指数，最高值为 2011 年的 54.9，最低值则为 2019 年的 -28.7。表 5 中列（3）的回归以该中美关系指数 (*Relationship Tone*) 替代模型（2）中美元首会晤的变量，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中美关

系数单独项显著为正,而抗美援朝烈士和中美关系指数的交乘项显著为负,与采用中美元首会晤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 工具变量分析

前述稳健性分析中考虑和检验了潜在影响本文结论的各类因素,同时也采用跨年数据进行了分析,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毕竟距今时间超过半个世纪,期间中国经历了若干次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强度存在差异,且核心解释变量可能被某些尚未控制的长期历史因素所影响。因此,本文的回归估计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节尝试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解决内生性带来的回归偏误问题。

本文内生性来源于烈士人数的分布。战争伤亡主要是士兵的伤亡,因此,志愿军兵员的集中来源地应当是抗美援朝烈士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首先,根据统计资料,1945年各人民军队兵员总数约为131.8万,1949年6月约为400万,1950年6月大陆地区主要战事结束时为500万。¹⁰抗美援朝战争使解放军推迟了精简员额的计划,1951年年底兵员总数达到了611万,为历史最高水平。¹¹抗美援朝期间特别是进行大规模攻防作战的五次战役(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期间,志愿军的兵员绝大部分仍是解放战争时期征募,因而解放战争时期征兵较多的地区更可能成为志愿军兵员籍贯集中的地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控制时间越久越稳定的地区,动员征兵工作应当越容易展开,征兵员额应当越多,因此人民军队控制时间这一因素满足工具变量所需的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其次,军队部署的地理因素也会影响兵员的籍贯地分布。已有一些研究以各城市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首都、指挥中心等的距离(李楠和林鑫,2015)或以与战争、革命爆发地距离(Aidt and Franck, 2015)为受战争影响程度的工具变量。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在距离朝鲜较近的地区部署或作战过的军队,兵力调动方便,作战环境和朝鲜也相对接近,这些军队可能在其驻扎、作战越久的地区征募兵员越多。比如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及其前身东北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地区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其主力成为首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部队。因此,距离朝鲜越近的地区,抗美援朝烈士相对数量会越多。

综合上述两个影响因素,本文设计了两个抗美援朝烈士相对人数的工具变量,分别为4000减去该地级市到中朝陆上边境最近公路距离千米数¹²(记为4000-*DPRK*,取自然对数)以及截至1950年7月1日人民军队累计控制一个地级市的平均日数(记为*Days*,取自然对数)。地理距离根据高德地图计算而得出。人民军队控制平均日数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各城市所辖县、市区最后一次被解放的时间到1950年7月1日的日数¹³,然后按照1953年各县市人口作为权重求得平均日数。

表6展示了两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中,到朝鲜距离和累计控制

¹⁰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6、405页。

¹¹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0页。

¹² 因为样本中距离中朝陆地边境最远的城市是临沧市,公路距离为3911千米。

¹³ 1950年5月舟山完全解放后,解放军已结束在大陆地区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事,解放战争在军事上结束,故以此为最终时点。各地解放时间取自《鲜血换来的丰碑:全国各市、县(旗)历次解放时间资料汇编》。

日数作为两个工具变量放入回归，第一阶段回归中两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均有显著正影响，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值都超过 28，远超一般判定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 15 (Stock and Yogo, 2005)。在相应的第二阶段回归中，烈士相对人数交乘项对并购投资影响仍显著为负，相应的 Hansen Test 的 p 值分别达到了 0.75 和 0.81，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无法证明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因而两个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可以得到保证。列 (3) 和列 (4) 中，将两个工具变量的交乘作为一个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交乘项对内生变量交乘项的影响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值分别达到了 48.8 和 52.2，也远超一般判定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被排除。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抗美援朝烈士相对人数交乘项仍在 5% 水平下显著。各控制变量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变化不大，宏观经济总量和金融业发展程度对吸引外资保持正面效应。工具变量分析结果进一步巩固了本文的结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烈士相对较多的城市会更不欢迎美国的并购投资，这是抗美援朝历史记忆长期存在的体现。¹⁴

表 6 工具变量法 2SLS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二阶段回归				
$US \times Martyr$	-1.282** (0.620)	-1.304** (0.616)	-1.306** (0.638)	-1.314** (0.634)
$US \times \ln(GDP\ per)$	0.288 (0.332)	0.202 (0.355)	0.286 (0.333)	0.202 (0.356)
$US \times \ln(GDP)$	1.204*** (0.184)	1.110*** (0.216)	1.205*** (0.183)	1.110*** (0.215)
$US \times Finance$	0.0188*** (0.00458)	0.0186*** (0.00453)	0.0188*** (0.00462)	0.0186*** (0.00457)
$US \times \ln(Trade)$		0.0181 (0.0903)		0.0177 (0.0895)
$US \times \ln(FDI)$		0.0526 (0.0690)		0.0526 (0.0691)
$Distance$	-0.274*** (0.0582)	-0.275*** (0.0582)	-0.275*** (0.0582)	-0.275*** (0.0582)
国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 456	16 456	16 456	16 456
R^2	0.061	0.061	0.061	0.061
第一阶段回归				
$US \times \ln(Days)$	0.0989*** (0.0243)	0.103*** (0.0224)		

¹⁴ 本文还对工具变量排他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满足实证要求，但限于篇幅未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续表)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回归				
$US \times \ln(4000-DPRK)$	0.167*** (0.0304)	0.157*** (0.0301)		
$US \times \ln(Days) \times \ln(4000-DPRK)$			0.0179*** (0.00256)	0.0178*** (0.00246)
Hansen Test p 值	0.75	0.81	—	—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值	29.5	28.3	48.8	52.2

(五) 移民和战争记忆

本小节进一步分析了地区间移民对战争历史记忆的长期影响。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张文宏和雷开春, 2008), 移民对投资、贸易以及城市发展路径等影响已被广泛认知(Javorcik et al., 2011; 铁瑛等, 2019)。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区人口流动的限制减弱, 外地人口的迁入可能会冲淡当地固有的历史记忆, 特别是移民中相当比例是异地就职的年轻人口, 他们对于战争历史的感受和认知可能更浅。据此, 本研究使用《2000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的迁入人口数据, 分别计算了各城市 2000 年总人口中从居住地所在县区以外迁入人口占比和居住地所在省以外迁入人口占比。据此, 在模型(1)中加入迁入人口比例(*Migration*)和美国虚拟变量、烈士变量的三重交乘项, 同时添加了迁入人口比例和美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作为控制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7 所示。

列(1)、(2)以外县区迁入人口占比测度移民占比, 分别以并购额和并购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其他各变量具体定义同表 2。列(1)、(2)三重交乘项虽然系数为正, 但在 10%水平上均不显著, 同时美国虚拟变量与烈士变量的基准交乘项保持显著为负, 说明外县区移民比例的多少, 并未显著地冲淡抗美援朝记忆对当地并购国别选择的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在列(3)、(4)中以来自外省的迁入人口比度量移民比例, 三重交乘项显著为正, 表明外省移民的增加显著地削弱了战争记忆对美国并购投资的影响。以列(3)为例, 外省移民占比增加千分之一, 交乘项系数就会降低 0.026。外县区移民和外省移民的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距离越远、经济文化背景差异越大地区间的人口迁徙, 越容易冲淡迁入地固有的历史记忆及其对当地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 本地人口通过血缘、社交等关系等因素的传递, 可能也是抗美援朝战争记忆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 官方的纪念、宣传和教育活动并非是唯一途径。

表 7 移民和历史记忆的交互影响分析

	外县市移民		外省移民	
	并购金额	并购次数	并购金额	并购次数
	(1)	(2)	(3)	(4)
$US \times Martyr \times Migration$	9.184 (8.148)	2.892 (2.677)	26.18* (14.26)	14.31*** (5.271)

(续表)

	外县市移民		外省移民	
	并购金额 (1)	并购次数 (2)	并购金额 (3)	并购次数 (4)
<i>US</i> × <i>Martyr</i>	-0.990** (0.418)	-0.342** (0.140)	-1.035*** (0.371)	-0.449*** (0.131)
<i>US</i> × <i>Migration</i>	5.371*** (1.449)	2.022*** (0.541)	5.516*** (1.845)	1.541** (0.6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 456	16 456	16 456	16 456
R^2	0.411	0.484	0.412	0.485

五、结 论

本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0—2019 年中国企业作为被收购方的跨国并购事件，考察了战争记忆对相关地区长期经济活动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抗美援朝烈士占 1953 年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对美国企业在当地的并购投资抵触更强，并购规模较其他国家会显著降低。在考虑革命烈士总数，以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指数等作为当代中美关系改善的衡量指标进行分析后，本文仍得出稳健结果。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使用各城市到朝鲜边境距离和人民军队控制各城市平均累计时间作为抗美援朝烈士变量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最后，本文发现外省移民比例的增加会减弱战争记忆的长期影响。本文研究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集体记忆，进而对不同地区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持久影响，这对理解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本研究表明，即使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记忆依然在显著影响着当前中国经济选择。抗美援朝精神依然是推动和团结我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精神财富。本研究将为我国在新时代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开放和发展新型大国外交提供重要参考。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D. Cantoni,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 (7), 3286-3307.
- [2] Ahern, K. R., D. Daminelli, and C. Fracassi,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Mergers a-

- 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7, 165-189.
- [3] Aidt, T. S., and R. Franck, “Democratization Under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Econometrica*, 2015, 83 (2), 505-547.
- [4] Alquist, R., N. Berman, R. Mukherjee, and L. L. Tesar,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Owne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18, 63-83.
- [5] Azzimonti, M., “Does Partisan Conflict Deter FDI Inflows to the U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20, 162-178.
- [6] Berger, D., W. Easterly, N. Nunn, and S. Satyanath, “Commercial Imperialism?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2), 863-896.
- [7] Che, Y., J. Du, Y. Lu, and Z. Tao, “Once an Enemy, Forever an Enemy?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1937 to 1945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2 (1), 182-198.
- [8] Chen, Y., Z. Fan, X. Gu, and L. Zhou,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 (11), 3393-3430.
- [9] Chung, W., and J. Alcácer, “Knowledge Seeking and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agement Science*, 2002, 48 (12), 1534-1554.
- [10] Davies, R. B., R. Desbordes, and A. Ray, “Greenfield versu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FDI: Same Wine, Different Bottl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 51 (4), 1151-1190.
- [11]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
- [12] 董莉军、谢家国,“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因素”,《经济纵横》,2014年第1期,第73—76页。
- [13] Du, Y., J. Ju, C. D. Ramirez, and X. Yao, “Bilateral Trade and Shocks in Politic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Some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1990-20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8, 211-225.
- [14] Erel, I., R. C. Liao, and M. S. Weisbach, “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 (3), 1045-1082.
- [15] Fan, H., F. Lin, and L. Tang, “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5, 1-19.
- [16] Fisman, R., Y. Hamao, and Y. Wang,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Exchange: Evidence from Shocks to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4, 27 (9), 2626-2660.
- [17] Frésard, L., U. Hege, and G. Phillips, “Extending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through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 30, 1539-1582.
- [18] Gao, G. Y., D. T. Wang, and Y. Che, “Impact of Historical Conflict on FDI Location and Performance: Jap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 (8), 1060-1080.
- [19] Glick, R., and A. Taylor, “Collateral Damage: Trade Disruptio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r”,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 (1), 102-127.
- [20]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3), 1095-1131.
- [21] Haufler, A., M. Mardan, and D. Schindler, “Double Tax Discrimination to Attract FDI and Fight Profit Shifting: The Role of CFC Ru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4, 25-43.
- [22] Heilmann, K., “Does Political Conflict Hurt Trade? Evidence from Consumer Boycot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9, 179-191.
- [23] Javorcik, B. S., C. Özden, M. Spatareanu, and C. Neagu, “Migrant Networ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4 (2), 231-241.
- [24] Kandilov, I. T., A. Leblebicioğlu, and N. Petkova,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Credit and Source Country Fi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7, 70, 288-318.
- [25] 李兵、任远,“人口结构是怎样影响经常账户不平衡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工具变量的经验证据”,《经济

- 研究》，2015年第10期，第119—133页。
- [26] 李磊、沈国明、包群，“‘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2—156页。
- [27] 李楠、林鑫，“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4期，第1325—1346页。
- [28] 李善民、李昶，“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研究》，2013年第12期，第134—147页。
- [29] 李飞跃、张冬、刘明兴，“抗日战争的经济遗产：国家能力、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第76—103页。
- [30] 吕越、陆毅、吴嵩博、王勇，“‘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第197—202页。
- [31] 毛其淋、许家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世界经济》，2014年第8期，第98—125页。
- [32] Miguel, E., and G. Roland,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 (1), 1-15.
- [33] Morrow, J. D.,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ajor Powers, 1907-19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92 (3), 649-661.
- [34] Nitsch, V., “State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Economy*, 2007, 30 (12), 1797-1816.
- [35] Norbäck, P., and L. Persson,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Why a Restrictive Cross-border Merger Policy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2 (2), 366-380.
- [36] Quresh, M. S., “Trade and Thy Neighbor’s Wa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5, 178-195.
- [37] Rossi, S., and P. F. Volpin, “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 74, 277-304.
- [38] Silva, J. S., and S. Tenreyro, “The Log of Grav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 (4), 641-658.
- [39] Singhal, S., “Early Life Shocks and Mental Health: The Long-term Effect of War in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9, 141, 102244.
- [40] Stock, J., and M. Yogo,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In: Andrews, D. W. K., and J. K. Stock (eds.),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1] 铁瑛、张明志、陈榕景，“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4—180页。
- [42] 王守坤，“政治资源禀赋的经济效应——来自长征沿线地区发展的证据”，《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79—192页。
- [43] 解大远、马骏，《鲜血换来的丰碑——全国各市、县（旗）历次解放时间资料汇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 [44] 闫雪凌、林建浩，“领导人访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2019年第2期，第147—169页。
- [45] 阎学通，《中外关系鉴赏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 [46]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
- [47]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17—141页。
- [48]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革命老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War Trauma and Cross-border Economic Activities

XUE Chang

(Wuhan University)

LI Ch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 Yichuan*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Trauma caused by wars is an important and long-lasting determina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manually collecting data of martyrs in the Korean War, we find the number of martyrs in a prefectur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s) volu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pattern does not hold for M&A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resident meetings and China-US relation are relatively weak in those prefectures with more martyrs. Moreover, inter-province migration alleviates the adverse effect of war trauma. Our research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Korean War; historical memory;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EL Classification: D74, F21, G34

* Corresponding Author: Hu Yichuan, Room 2006, Tongji Building A, No. 1500 Siping Road, Shanghai 200092, China; Tel: 86-13817631745; E-mail: ychu@tongji.edu.cn.